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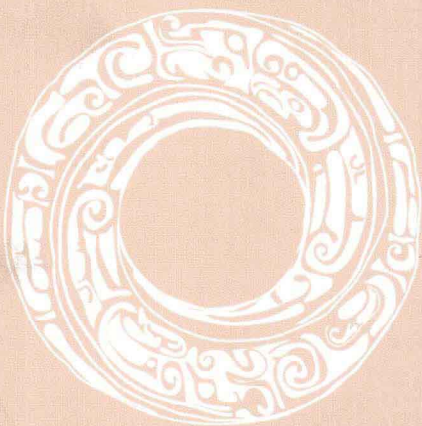


郑大史学文库

动荡与嬗变

——民国时期河南社会研究

徐有礼◎著





郑大史学文库

动荡与嬗变

——民国时期河南社会研究

徐有礼◎著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动荡与嬗变:民国时期河南社会研究/徐有礼著.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13. 1

ISBN 978 - 7 - 5347 - 7118 - 7

I. ①动… II. ①徐… III. ①河南省—地方史—研究
—民国 IV. ①K296.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07912 号

动荡与嬗变:民国时期河南社会研究

出 版 人 王刘纯
特邀编辑 杨天荣
责任编辑 杨天敬
责任校对 张 涛 裴红燕 倪玉秀
封面设计 高银燕
版式设计 张 帆
监 制 杨吉哲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郑州市开元路 16 号 邮政编码 450044)

发行科 0371 - 63863551 总编室 0371 - 63863572

网 址 www.daxiang.cn

印 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379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3.0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二环支路 35 号

邮政编码 450012

电话 (0371)63956290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郑州大学三期“211”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考古学与中原文化”及历史学重点学科经费的资助

“郑大史学文库”编辑委员会

主 编 韩国河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星光 安国楼 张民服 张旭华
张国硕 谢晓鹏 韩国河

总序

郑州大学历史学科创建于1956年,1976年增设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专业。1981年中国古代史、专门史、世界史专业获得首批硕士学位授权点,1996年中国古代史专业获得博士学位授权点,2003年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专业获得博士学位授权点,并获得了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2006年获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2007年,中国古代史专业被确定为国家重点(培育)学科。历史学为国家级特色专业,也是河南省一级重点学科。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中原文化资源与发展研究中心为河南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50多年来,历史学科名师荟萃。嵇文甫、秦佩珩、荆三林、史苏苑、刘铭恕、张文彬、高敏、李民、戴可来等知名教授学者曾在此执教。目前,历史学科已形成年龄、职称、学历、学缘结构相对合理的学科及师资队伍。现有教授24人,副教授21人,讲师9人;具有博士学位者25人,多来自国内著名高校;有博士生导师15人,省特聘教授2人,“百千万人才工程一二层次入选者”1人,国务院政府津贴获得者2人,省管专家4人,省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12人。

近几年来,历史学科先后承担并完成的主要科研项目有:国家“十五”“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中国古代文明与考古学”“考古学与中原文化”;国家“十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子课题“登封南洼遗址的发掘与研究”;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计划中国古代史学科建设等。在研与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十余项,横向科研项目15项,科研总经费达2000余万元。

经过50多年的积累和发展,历史学科已凝练成相对稳定并具有各自优势特色的研究方向。如在先秦思想史、秦汉史、人口史、魏晋南北朝史等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在田野考古、陵寝考古、城市考古、科技考古、中原考古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三礼及郑注研究和整理、出土古文字整理与研究方面,有深厚学术积淀;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近代妇女史、港澳史等方面的研究颇具影响,同时与河南地方史研究相结合,显示出学科实力;在明清经济史、区域经济史、宋代民族史、移民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在东南亚史尤其是越南史,以及犹太史、欧洲文化史方面,取得了不少高水平成果;在中原历史及古代文明、中原历史文化遗产、中原科技史等方面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为弘扬中原文化、推动河南省文化事业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目前,历史学院的基本定位是依托中原地区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充分发挥师

资力量雄厚、科研成果丰硕、学科实力较强的优势,以培养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创新型专业人才为目标,以本科教育为基础,积极发展研究生教育,努力把历史学院建设成为在全国有重要影响的学术研究型学院。办学思路是以教学工作为中心,以学科建设为龙头,以人才质量为生命,不断加强对学生综合能力和基本素质的培养,努力造就系统掌握专业理论知识,并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级专门人才。具体来讲,历史专业要大力弘扬中原文化,积极为河南省的“文化强省”建设和“中原经济区”战略提供智力支持。考古专业要充分利用河南文物大省的优势地位,积极开展田野考古实习与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工作,注重培养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人文科学实验班(国学方向)在推行“2+2”培养模式上,积极构建文史哲交叉融合的一体化教育平台,强化学生的人文素质和综合能力。

为了实现历史学院又好又快地发展,我们必须抓住国家“千人计划”和河南省“百千万工程”的机遇,实施新一轮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历史学院一贯认为:人才是学院兴盛的保障。一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尤其是要发挥老专家、老学者的传承与帮带作用。二是积极引进名校毕业的博士,改善人员梯次和年龄结构。三是注重人才成长与学科建设、科学研究的关系。四是平衡郑大人才固有传统和新兴学科人才群的关系,达到人才和谐、共同进步的最佳状态。

为了实现学术研究型学院的目标,我们必须切实提高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历史学院一贯主张:专业建设需要突出专业的特色和优势。首先是加大教授为本科生授课的力度,突出专题研究教学内涵,引导学生对历史考古研究的学术兴趣。其次是突出实践教学环节,加大中原历史文化的教育特色以及国学教育的内容,搭建嵩阳书院的教学平台,达到厚基础、宽口径的学术探索目的。再次是培养一支优秀的中青年教师队伍,彰显教师个人的研究领域和水平,形成“黄金教学研究链条”。

为了实现各研究方向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倡导顶天立地抓科研,努力提高科研水平和成果转化能力。历史学院的一贯做法是:科学研究是立院根本。一是营建科学研究的人文氛围,建立科学研究的奖惩机制。二是加大重点学科的建设力度,出原创、出精品。三是充分发挥学科带头人的科研引导作用,努力承担国家、省部级项目以及社会服务工作。四是正确引导学生(本科及研究生)对科研对象、领域的选择,包括大学生的假期实践活动,也要贯穿科研意识和能力的培养。

“郑大史学文库”系列著作的出版,就是基于以上的历史积淀和现实考虑,一方面是展示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师的学术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也是学者自己对学术研究的一个深层总结与回顾,在此基础上,选择和坚持更加明确的学术研究方向,瞄准学术前沿问题,开展更为深入的科研工作。

司马迁说过:“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追求。是为序。

韩国河

2011年4月7日

前 言

河南地处中原,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在古代,河南长期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沟通、汇聚中外文化的中心区域和向四周辐射的起点之一。但是,宋元以来,随着政治中心的转移,河南社会发展呈现出缓慢、停滞的局面。近代以来,沿海、沿江地区近代化历程开启,并在不同时期、不同层面有了较快发展,而地处内陆的河南则进一步拉大了与上述地区的差距。直到清末民初,河南才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等方面开始了新的转型。但是,政局的混乱、新旧社会问题的交织及其他各种因素的制约,使河南社会进步阻力重重,发展缓慢。“动荡与嬗变”是民国时期河南社会转型的基本特点,从宏观角度横向比较,这一特点似乎和国内不少省区具有共性;从区域性微观考察出发,则带有不可替代的地方特色。

辛亥革命前后,河南经历了政权的更替。在封建专制势力的严密统治下,新兴阶级和政党力量单薄,响应武昌起义争取实现“共和”的奋斗惨遭镇压而失败。在周边省份相继宣布“独立”的氛围中,河南却上演了一出“请愿共和不独立”的闹剧。只是全国革命高潮的激荡,才帮助河南摆脱了封建王朝的统治,进入了民国时期。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不久,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在政治体制上开始集权于中央,在“共和”名义下实施军阀统治。民国时期,河南社会历经北洋政府(1912~1927年)和国民政府(1927~1949年)的统治,体现民主、共和特点的政权体制在构建和运行过程中道路坎坷。作为袁世凯的“桑梓之地”,河南共和政体的确立和完善笼罩在“帝制自为”复辟企图的阴影中。所谓“凡事多出亡清之故辄”,概括了执政者的政治理念,清楚地解读了民国初年河南政体从内容到形式的旧痕迹。在军阀间扩充地盘、争夺中央政权的连年征战中,河南因战略地位的重要而深受其害。北洋政府统治时期,较大战争和兵变发生或主战场位于河南的达8次之多,省内派系错综复杂的驻军最多年份达到30万人,说“年年打仗,遍地皆兵”一点也不为过。战争的获胜者往往成为全省的最高统治者。如: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驱走赵倜的冯玉祥出任河南督军;1924年年底,河南被划分给了参与北京政变的国民二军,其军长胡景翼出任河南督办;1926年春,吴佩孚赶走国民二军,重新控制河南,其部下寇英杰得以出任河南督理。获胜者在督军(督理、督办等)位上大权独揽,不仅管军,且要管政,民政长官自省长以下均成其附庸,不仅人事安排完全听命于军阀,而且一切施政方针均以其军事需要为转移。更有甚者,直系军阀吴佩孚于1920年率兵屯驻洛阳,以直鲁豫巡阅副使(后升任巡阅

使)充当河南地区的太上皇,并且遥控北京政府,一时成为全国瞩目的中心。在这样的背景下,虽然一切共和政体的要素如各级政权、省议会等依然存在,但却唯军阀马首是瞻,与民主政治风马牛不相及。

1927年6月以后,北洋军阀在河南的统治结束,河南进入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但是,直到1930年10月中原大战结束,以冯玉祥为首的河南政权对中央政权仍保持着半独立状态。同是“三民主义”、“训政”时期,冯玉祥与南京诸人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贯彻。与1922年第一次督豫时相比,冯玉祥已经由一个封建旧军阀转变成为国民党领导下的重要军事将领。但是,在依据共和体制治理地方的问题上冯玉祥仍然延续着“以军代政”、“以军治政”的旧思路。这既是全国形势使然,也和河南局势有关。从1927年6月到1930年10月,河南发生重大战争10次,其中包括中国近代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军阀混战——中原大战。长期处在战争的环境中,一切政治体制的改良和施政措施的落实基本无法走上正轨。

1930年10月到抗日战争爆发,河南直接纳入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轨道。其间,无论是省、县等机构的设置和改革,还是各种行政制度的部署和施政措施的推行,无一不与全国各省市接轨。所不同的是,河南又处于国民党“剿共”战争的前沿,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以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基本上掌控着全省官吏的任免与奖惩,又把诸如行政督察专员制度、保甲制度等先行在河南等省试验,然后推及全国。一般说来,在这个社会渐趋稳定的时期,“以党治国”的“训政”体制也力图完备。在党政关系、官吏任用、考核、奖惩、政治视察等方面形成了一定的规则和模式,特别是以省政府各机关人员组成的视察团对各县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考察,对当地官吏政风、政绩的考评与公开发表,有助于吏治和社会风气向好的方向发展。当然,“训政”时期并无民意机关的设立,更谈不上民主政治的实施。相反,“清党反共”政策表面上巩固了专制统治,实际上埋下了政权裂变的潜在种子。

1937年7月到1949年年底,河南省政府经历了从动荡中的播迁到覆亡的全过程。抗日战争时期,省政权随着日本的侵略而在豫西南、豫西辗转,统治区域也随着战局的演变而日渐缩小。虽然最后局促于伏牛山深处,但也坚持抗战到底了。1945年9月,重返开封的省政府立即投入到内战的准备中。1946年6月,全面内战首先在河南爆发。一年以后,人民解放军“三路大军会中原”,由战略防御转入了战略反攻。1948年10月以后,河南省政府离开开封,再一次在豫南、湖北、广西、四川间流亡,最后走向覆亡。

自民国初年到1949年,“军事统治”几乎成为河南社会政治的常态。据统计,37年间河南省级主官共历19人次,其中以现役军人兼任行政主官者达16人次,足以说明这个问题。但是,无论是“督军政治”还是“以党训政”,朝令夕改下的政体紊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河南官场自清末以来的吏治腐败现象,特别是县级以下政权几乎成为监察考核制度鞭长莫及的盲区。“保长甲长,脖子发痒;联保主任,不用审问”的

民谣在河南流传甚广,道出了广大民众不满与无奈的心声。

对“共和”的期望和对现实的失望改变着人心向背,新民主主义政权虽然以“异端”崛起并屡遭挫折,却真正代表着社会政治的发展路向。在反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中,豫边敌后的新民主主义政权由小到大、由弱转强,最大限度地争取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在加速旧政权裂变的过程中最后取得了胜利。

如果说,民国时期河南政治处在持续的动荡中,那么,河南社会经济则处在一个嬗变的过程中。一般来说,社会的经济形态、生产方式甚至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往往不会随着政权的更替而发生突变,在某些方面甚至会有一个较长的渐变过程,或者说表现为一个由部分变革到完全变革再到逐渐完备的过程。当然,不同政权的更替、建立对社会经济形态、生产方式的影响也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这种影响的大小、效果的好坏与这个政权的政策、方针、性质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如恩格斯论述过的那样:“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现在在每个大民族中经过一定的时期就都要遭到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推动它沿着另一种方向走。这第三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①民国时期,代表国家权力的省政权对经济的反作用更多的时候是恩格斯所列举的第二、第三种情况。

河南自古就是一个农业大省,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结构十分稳定和牢固。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外国资本对焦作煤炭资源的开发和运销(专用铁路线的修通),京汉铁路过境而过和支线汴洛铁路的修筑,以及英美烟公司选定豫中许昌一带作为烟叶基地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渗入内陆省份河南并不断扩展,自然经济的解体过程也随之开始了。

直到20世纪初,河南省内才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近代工矿企业。从时间上看,与沿海、沿江发达地区相比,大致有30年的“时间差”。河南的民族工业从煤炭开采起步,带有与列强争夺矿权、保护资源的明确目的。而纺纱、面粉制造、蛋品制造等行业的产生,则反映了全国民族资本向轻工业倾斜的态势。但是整个民国时期,具有较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大量的劳动力、铁路交通运输条件良好的河南,近代工业却始终没有突破性的发展。官办企业数量少,规模小,在经济生产中的影响微乎其微;私人资本企业资金积累困难,税负沉重,惨淡经营而难以生存和发展。即使有郑州豫丰纱厂(上海资本家穆藕初创办)、卫辉华新纱厂(京津周学熙集团创办)等沿海地区资本内流,试图凭借河南的“地利”而生财,也因受制于混乱的政局而举步维艰,甚至在恶劣的环境中走向破产。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对河南

^①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于伦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下),河南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483页。

沦陷区的掠夺,极大地摧残了基础十分薄弱的河南经济。一些前期西迁的工矿企业留在了曾经的大后方,如豫丰纱厂、巩县兵工厂等,留在省内的厂矿在“军管理”下成为日军“以战养战”的工具。在连绵不断的战争打击下,河南民族工矿业一蹶不振。

尽管如此,近代企业的出现毕竟代表了一种社会进步,或者说是在向前缓慢地发展。在传统的农业生产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主要有:农作物种植方面,经济作物如棉花、花生、芝麻、烟叶、茶叶等种植量有较大规模的增加,形成了一些区域性的生产中心,如豫北的棉花、豫中的烟叶、豫东的花生等。得益于铁路、公路的逐渐延伸和新兴商业城镇的形成,农产品的交易活动十分活跃,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技术相应地得到改善,新型农业机械有所引进和使用。但是,所有这些,尚未对传统的自然经济形成根本性的冲击。不仅在偏远地区广大农村的人们仍然固守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男耕女织”的生产、生活模式,就是在铁路沿线商品化程度较高的地区,频繁的战争和混乱的政局也常常左右着农民生产目标的取向及由此造成的回归传统的摇摆性。

在经济发展的影响下,铁路有效地拉动了河南近代化的进程,或者说,铁路是城镇化、市场化、工业化发展的重要动因之一。京汉铁路的通车,使沿线的一些不知名的小县、小镇进入繁荣发展期,一批新兴商业性城镇的崛起取代了传统的商业中心,成为民国时期河南社会进步的主要体现。比如古都郑州,曾经有过商代的辉煌,但在以后的历史朝代中默默无闻,直到20世纪初京汉铁路通车后,才以两路交会、自开商埠而引人注目,被人们称为“火车拉出来的城市”。又如安阳、新乡、信阳、许昌都是民国时期近代工业、商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其原因也大都来自铁路交通的便利。而漯河、驻马店则属于另一种类型,原本隶属于郾城、确山县的这两个镇,伴随着车站的建立而在全局发展上超过了原来的县城。此消彼长,原来的一些商业中心无可挽回地衰落了。比如明清时期全国四大名镇之一的开封朱仙镇,由于铁路取代水路而失去了商业枢纽的地位,难以再现昔日的辉煌。又如赊旗镇、柳园镇等也存在类似遭遇。

据统计,1949年河南全省工农业总产值为21.02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为2.29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0.9%;农业总产值为18.73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89.1%。人均工农业总产值为50.3元,比全国平均水平低41%,居全国20位以后。粮食亩产110斤,与西汉时期基本持平。主要工业品配额每年每人平均:棉布0.13尺,不到一盒烟,0.1度电,0.17盒火柴,22公斤煤。^①上述数据,直接反映了民国时期河南的落后状态,也清楚地展示了河南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和起点。

民国时期,地方自治是一种具有相当影响的社会思潮。自清末到北洋政府再到国民政府,都有实施地方自治的相关法令和程序部署,并且与政治体制的转换、完善

^① 郭予庆等主编:《河南经济发展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75、377、380页。

及民主政治的实施相联系。尽管以基层社会为主要对象的地方自治活动本质上从属于政治,但具体措施的推行却在实际上包括了经济、教育等内容,其中相当一部分具有社会改良意义。

民国时期河南是国内地方自治活动比较活跃的地区之一,官方推行地方自治与地方精英(地方实力派)在自治旗号下进行区域性改革,使民国时期河南的地方自治形成了两条平行的轨道。处在二者之间的,有一大批热衷于自治的知识分子及由他们组成的自治团体。一方面,他们持续地、不遗余力地进行自治理论、学说、规划等的传播与灌输;另一方面,他们又通过参与官方自治活动和协助地方精英们的社会变革进行地方自治理论的实验。

发端于镇平县,逐步向内乡、淅川、邓县等地扩展的“宛西自治”是民国时期河南地方自治活动的典型代表,在20世纪30年代国内的乡村建设运动中颇有影响。由彭禹廷提出并得到别廷芳、陈重华、宁洗古等地方精英认同的“三自主义”(自卫、自治、自富)是宛西自治的理论依据,又是彼此交叉渗透、依次递进的社会政策或社会变革程序,而各类教育事业则要求贯穿于这三个环节之间。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晏阳初的“平民教育”等理论不同的是,宛西的“三自主义”将其理论渊源界定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将“三自主义”列为三民主义的缩小,或者是三民主义在宛西的实现。由宛西而全省、全国,最终是三民主义大同世界的建立。置于“训政”背景的考察,这一做法无疑具有一定的自我保护意义。与此同时,“三自主义”自产生之日起,就最大限度地世俗化,力图为一般民众所了解、理解和认同,并为实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村村无讼、家家有余”的目标而追随和参与自治。与国内知识界以团体力量选择农村某个点进行乡村实验的情况不同,宛西自治基本上是“生于斯、长于斯”,即当地精英们的自觉行为。“本地人”的身份带来了较高的号召力和亲和力,从“自卫”入手率先解决最为迫切的社会矛盾,使得宛西自治一度收到了一呼百应之效。

持续时间达10年之久的宛西自治是一次带有强烈内向性和区域性的社会变革活动,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取得了不少进步,但终究仅仅完成了由“官治”到“绅治”的转换,与真正的自治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宛西自治的失败固然有“人亡政息”,即精英政治不可避免局限的原因,根本原因还是近代中国类似改良主义活动的共同命运使然。

在由封建帝制向共和体制转换过程中,近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思想上、观念上的更新,使得传统沉积的社会风气顺时而变成一种必然的趋势。民国时期,自冯玉祥之后,强制性地改变社会风气特别是清除陋习是河南一项重要的社会活动。冯玉祥不无极端地拆庙宇、推神像,动员女子放足,开展卫生清洁大扫除运动等,造成了剔除社会陋习的氛围,触动了一般民众的生活,留下了深远持久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新生活运动是一种思想文化或精神层面维护统治的措施,而且从一般民众衣食住行的改造入手。因此,形式上一度轰轰烈烈的新生活运动,大都停留在涉及社会风气方面的某些举措。虽然有着比较完备的组织机构,条文规章罗列众

多,但脱离民众迫切需求的新生活运动流于表面现象,即使在改变社会风气方面也少有收效。其间,各地社会风尚状况列入了政治视察和社会调查的范畴,体现社会风尚备受关注的程度。但在调查资料中对诸如缠足、蓄辫、吸毒、赌博等社会陋习的记载却令人沮丧,除了城镇以外,广大农村特别是偏僻之地,新的社会风尚还远远没有树立。

近代中国处在一个社会转型期,河南也不例外。转型期新旧社会问题的交织,使社会现象更加多样化、复杂化。按照学术界的一般定义,社会问题应该指那些影响大多数人的生活、必须用全社会的力量才能解决的社会现象。民国时期,河南社会问题众多,但最严重的莫过于枪会、土匪和灾荒问题。

如前所述,民国时期河南战争频繁,直接造成了诸多社会问题。军队、枪会、土匪并立的社会势力格局,即是这种情况的反映。在连绵不断的军阀混战中,败军之溃兵沦为土匪——土匪被收编变为军队——军队再败溃兵重新为匪——枪会群起自卫御匪御兵……形成了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虽然枪会遍及华北诸省,土匪也绝不限于中原,但论数量之多、活动范围之广、影响之大、国内外媒体关注程度之高,河南都无可争议地名列前茅。

枪会是一种组织形式原始、落后的民众自卫团体,是民间传统秘密会社在新形势下的公开的扩展。民国时期,河南枪会经历了从公开到异化的全过程,从单纯的民间自卫武装,到为政治势力所用,背离了其发起的主旨,导致被民众抛弃的结局。土匪则将农民武装反抗暴政的举动与杀人越货的行径纠结在一起,在行为判断方面留下了许多相互矛盾的记载。抗日战争以前特别是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河南境内三大社会势力中的一个反常现象是:军队怕(或勾结)土匪,土匪怕枪会(甚至假借枪会之名),枪会遭军队镇压。所有这些,归根到底反映了政治统治的势弱和黑暗,当政者无意或无力承担维护正常社会秩序的职责,从而造成了社会的动荡不安和人民群众被迫采取多样的自保形式和措施。

灾荒问题似乎更多的是天灾,其中却隐含着人祸的因素。民国时期,河南是自然灾害的高发区,几乎所有的灾害种类都曾多次光顾,其中尤以1942~1943年的灾荒因美国《时代》周刊和《大公报》记者的报道而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而1938年6月的郑州花园口决堤导致黄河改道,豫、皖、苏三省44县惨遭水灾的事件,直接造成上千万人流离失所,更为黄泛区的生态环境治理留下一个长期的历史任务。

《动荡与嬗变——民国时期河南社会研究》是笔者多年从事河南地方史研究与教学的习得汇集,在体例编排方面,没有刻意追求通史、断代史或专史般的规范格式;在内容取舍方面,不求十分完备而力图减少与学界同仁相关研究成果的重复;在史料选择方面,鉴于收集的困难而在某些问题的论述中有偏多保留的倾向;在方法、观点诸方面,限于学识水平,不当之处在所难免,尚望学界不吝赐教。

徐有礼

2009年7月

目 录

第一章 共和政体的紊乱与裂变	1
一、“共和”招牌下的军阀政治	3
(一) 武人当政与政坛乱局	3
(二) 昙花一现的“新气象”	13
二、“训政”名义下的国民政府统治	24
(一) 历经坎坷的“训政”之途	24
(二) 党政关系与吏治整饬	46
三、人民政权的出现和胜利	58
(一) 新型政权的出现	58
(二) 人民政权的胜利	63
第二章 踟蹰缓变的社会经济	79
一、自然经济的蹒跚解体	81
(一) 外国资本的侵入和活动	81
(二) 农业生产的新变化	93
(三) 家庭手工业的变化	104
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缓慢发展	107
(一) 近代工矿业艰难发展	107
(二) 商业城镇的兴起和银号的惨淡经营	115

三、抗战时期经济的衰败和人民负担的畸重	125
(一)抗战时期日本对河南沦陷区的经济掠夺	125
(二)抗战时期经济建设事业的萎缩	137
(三)人民负担的畸重	139
四、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	141
(一)土地制度的变革	141
(二)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经济建设	145
 第三章 地方自治和社会风尚改良	153
一、官民交织的地方自治活动	155
(一)官方掌控下的地方自治	155
(二)自治追求下改良实践的兴衰	163
二、剔除陋习的励俗活动	174
(一)冯玉祥“破旧立新”	174
(二)新生活运动的推行	179
(三)20 世纪 30 年代社会风俗“教化”活动	183
 第四章 社会问题及其治理	197
一、枪会：秘密社团的公开与异化	199
(一)枪会的活跃与消沉	199
(二)其他民间会社	213
二、土匪：反抗与祸患的纠结	218
(一)武装起义和打家劫舍的互悖	218
(二)“多似乱虱”的“土匪世界”	226
(三)土匪日益政治化与走向末路	235
三、灾荒的困扰和救灾	238
(一)民国初年到抗日战争前的灾荒	238
(二)抗日战争时期的灾荒	253
 参考书目	275
 后记	279

第一章 共和政体的紊乱与裂变



